

御园，再叙它的光荣与屈辱

名家名作
精选集

The Imperial Garden Yuanming Yuan

追寻失落的 圆明园

汪荣祖 著 钟志恒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ained sensibility added but also thanks to technological advances, a techniques, and artistic taste facilitated a boom in garden construction. The beauty of hills, ponds, streams, trees, and flowers of artificial gardens for private gardens continued into the Ming-Qing period for the elite and level of luxury of the Imperial garden. In 962, the founding emperor, founding palaces and gardens (Songshi 1977:2097). In addition to refuge (Yulin Yuan), the royal family built two branches of the Imperial Garden, successfully. They came of age by the early twelfth century. Ever since, the garden, closed when the emperor left in winter (Ye Maide). If you Gerny is completed by Emperor Huizong (c. 1101-1125). In 1117, the emperor was a gifted artist who specialized in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as well as precious trees, flowers, and bamboo forests in the garden. (rocks from Lake Tai) to be transported from South China. The price for the heavy rocks all the way to Kaifeng, but also down the road along the make way for the rocks (Songshi 1977: 77:101-77:102; c. Guilin Tushu, 1149), transferred to the garden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first

博雅
名家名作
精选集

A Paradise Lost

The Imperial Garden Yuanming Yuan

英汉对照

追寻失落的 圆明园

汪荣祖 著 钟志恒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京权图字:01-2010-5615

© 2000,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追寻失落的圆明园 = A paradise lost: the imperial garden Yuanming Yuan: 英汉对照 / 汪荣祖著; 钟志恒译.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3.3

(博雅双语名家名作精选集)

ISBN 978-7-5135-2839-9

I. ①追… II. ①汪… ②钟… III. ①圆明园—研究—英、汉
IV. ①K928.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 第 043422 号

出 版 人: 蔡剑峰

系列策划: 吴 浩

责任编辑: 易 璐

装帧设计: 视觉共振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650×980 1/16

印 张: 372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5-2839-9

定 价: 1300.00 元

* * *

购书咨询: (010)88819929 电子邮箱: club@fltrp.com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联系电话: (010)61207896 电子邮箱: zhijian@fltrp.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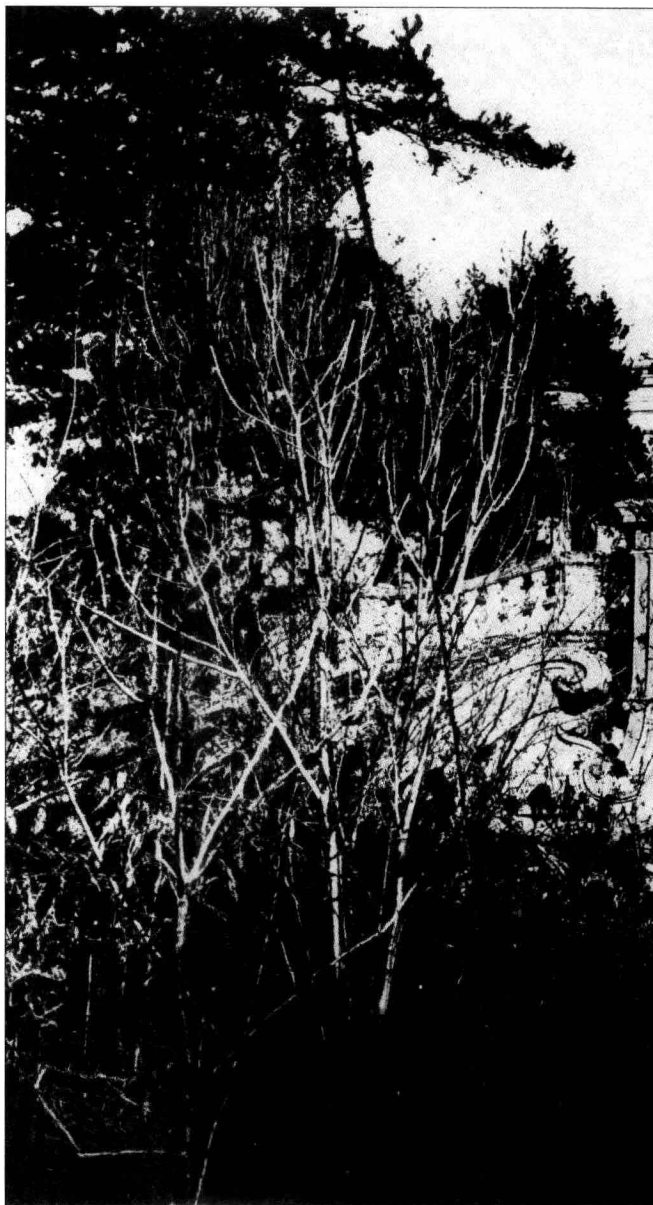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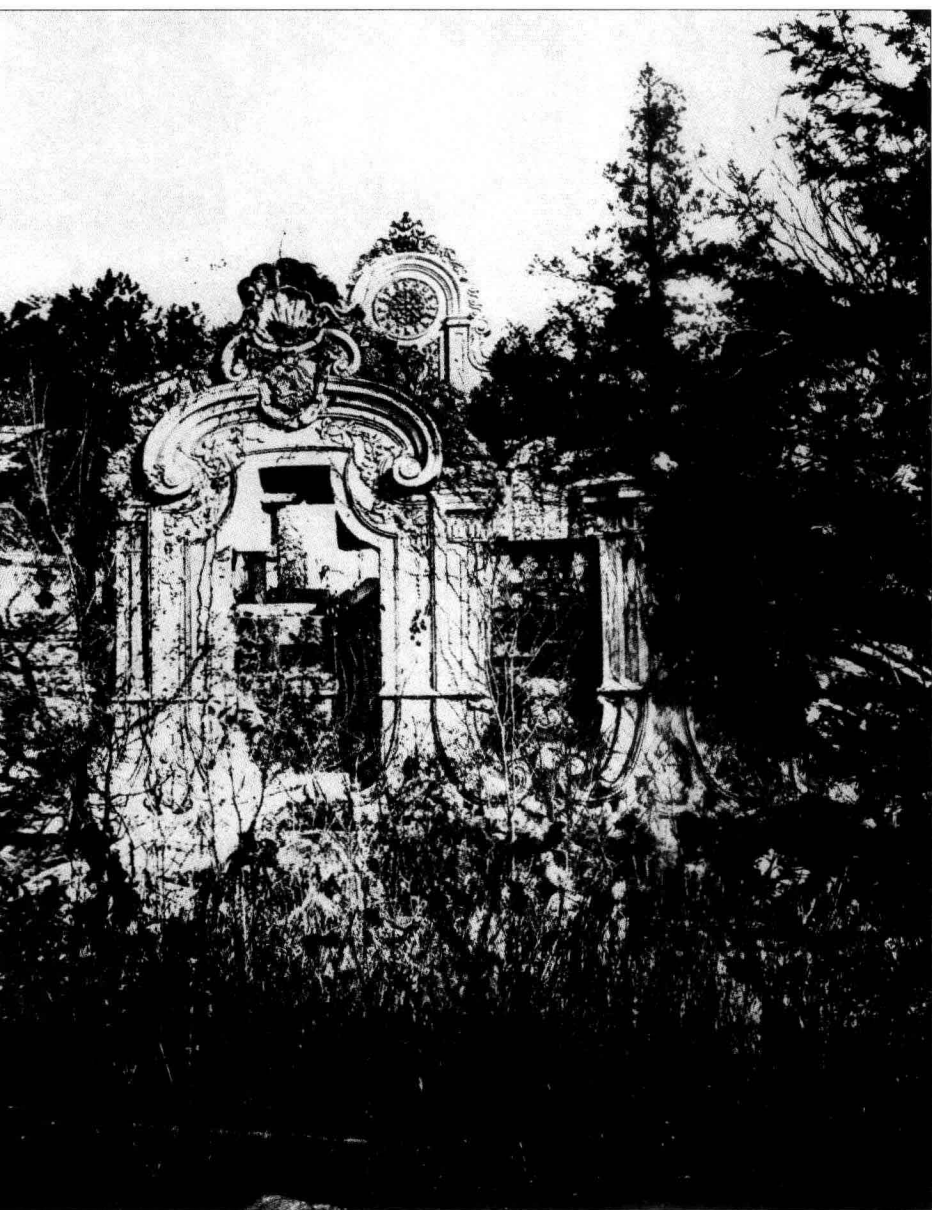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物料号: 228390001

大水法残迹

恩斯特·奥尔末(Ernst Ohlmer)
摄于1873年, 恩斯特·柏石曼
(Ernst Boerschmann) 收藏, 出
自滕固编《圆明园欧式宫殿残
迹》(商务印书馆, 1933年)。





“博雅双语名家名作”出版说明

1840年鸦片战争以降，在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中华民族精英“放眼世界”，向世界寻求古老中国走向现代、走向世界的灵丹妙药，涌现出一大批中国主题的经典著述。我们今天阅读这些中文著述的时候，仍然深为字里行间所蕴藏的缜密的考据、深刻的学理、世界的视野和济世的情怀所感动，但往往会忽略：这些著述最初是用英文写就，我们耳熟能详的中文文本是原初英文文本的译本，这些英文作品在海外学术界和文化界同样享有崇高的声誉。

比如，林语堂的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吾国与吾民》）以幽默风趣的笔调和睿智流畅的语言，将中国人的道德精神、生活情趣和中国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娓娓道来，在美国引起巨大反响——林语堂也以其中国主题系列作品赢得世界文坛的尊重，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再比如，梁思成在抗战的烽火中写就的英文版《图像中国建筑史》文稿（*A Pictorial Histo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经其挚友费慰梅女士（Wilma C. Fairbank）等人多年的奔走和努力，于1984年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MIT Press）出版，并获得美国出版联合会颁发的“专业暨学术书籍金奖”。又比如，1939年，费孝通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博士论文以 *Peasant Life in China—A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tze Valley* 为名在英国劳特利奇书局（Routledge）出版，后以《江村经济》作为中译本书名——《江村经济》使得靠桑蚕为生的“开弦弓村”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成为国际社会学界研究中国农村的首选之地。

此外，一些中国主题的经典人文社科作品经海外汉学家和中国学者的如椽译笔，在英语世界也深受读者喜爱。比如，艾恺（Guy S. Alitto）将他1980年用中文访问梁漱溟的《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一书译成英文（*Has Man a Future?—Dialogues with the Last Confucian*），备受海内外读者关注；

此类作品还有徐中约英译的梁启超著作《清代学术概论》(*Intellectual Trends in the Ch'ing Period*)、狄百瑞(W. T. de Bary)英译的黄宗羲著作《明夷待访录》(*Waiting for the Dawn: A Plan for the Prince*), 等等。

有鉴于此,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推出“博雅双语名家名作”系列。

博雅, 乃是该系列的出版立意。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得以提倡, 旨在培养具有广博知识和优雅气质的人, 提高人文素质, 培养健康人格, 中国儒家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亦有此功用。

双语, 乃是该系列的出版形式。英汉双语对照的形式, 既同时满足了英语学习者和汉语学习者通过阅读中国主题博雅读物提高英语和汉语能力的需求, 又以中英双语思维、构架和写作的形式予后世学人以启迪——维特根斯坦有云:“语言的边界, 乃是世界的边界”, 诚哉斯言。

名家, 乃是该系列的作者群体。涵盖文学、史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考古学、人类学、建筑学等领域, 皆海内外名家一时之选。

名作, 乃是该系列的人选标准。系列中的各部作品都是经过时间的积淀、市场的检验和读者的鉴别而呈现的经典, 正如卡尔维诺对“经典”的定义: 经典并非你正在读的书, 而是你正在重读的书。

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1919年12月1日,《新青年》第7卷第1号)一文中提出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范式。秉着“记载人类文明、沟通世界文化”的出版理念, 我们推出“博雅双语名家名作”系列, 既希望能够在中国人创作的和以中国为主题的博雅英文文献领域“整理国故”, 亦希望在和平安发展、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为“再造文明”、为“向世界说明中国”略尽绵薄之力。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人文社科出版分社

双语版新序

拙著《追寻失落的圆明园》英文初版于 2001 年由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台北麦田出版社于 2004 年译成中文出版，翌年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又出了简体字版，“麦田”复于 2007 年出了新版。今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尚未谋面的乡友吴浩先生鼓励我于圆明园焚毁 150 周年之际出个双语版，作为作者的我，当然欣然同意，感激浩兄的热心，并为此书能一再重印而感到幸运与高兴。

中国园林艺术有几千年的历史，至建造圆明园时，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然而由于此一代名园被英法联军焚毁，同治帝虽修复了一部分，又遭遇到八国联军的摧残，民国以后几乎无人看守，不断遭遇到破坏，在遗址上所能见到的只是西洋楼区的一些残垣断壁，以至于有不少人误认为西洋楼就是圆明园。把圆明园说成是中国的凡尔赛宫，就是一大误会。其实，整个西洋楼只是圆明园的一小部分，而模仿凡尔赛宫的海晏堂又是西洋楼的一小部分。圆明园内西洋楼的设计与建造都不是出自专业人士之手，所以不可能是西洋建筑中的精品，也远不能与大部分圆明园的景点相提并论。雨果（Victor Hugo）没有到过圆明园，他主要在谴责西洋文明中的霸道与残酷部分，在西方多元社会里，多少有一些反潮流的“良心”人士，发出道德的怒吼。美国文豪马克·吐温（Mark Twain）在一篇题为《致蹲在黑暗里的人》（“To the Person Sitting in Darkness”）的文章里，也声讨八国联军的烧杀掠夺，指出以文明自傲的西方人竟像野蛮的强盗。法国的雨果与美国的马克·吐温先后指帝国主义者的掠夺为“强盗行为”。我们知道，如果没有八国联军的二度破坏，不会导致圆明园完全成为废墟。

圆明园有 150 年辉煌的历史，而今火烧圆明园也有 150 年了。值此纪念往事之际，当然会关切到名园何以“失落”的问题。导致圆明园焚毁的英法联军入侵之役，牵涉到中西关系，问题的根本在于两个不同体制的冲撞。西方的罗马帝国崩溃后，经过一千年的演变成为“列国”（民族国家），

而大清帝国仍然是中华帝国的延续。按照中华帝制，见皇帝要下跪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在西方人看来就是故意屈辱了。我们可以责备清朝皇帝老大不明世界情势，但怎能期待皇帝为了外国人的感受而破坏自己的体制？我想也没有任何外国领导人会破坏体制去见远来的客人。体制碰撞，两不相让，最终只有诉诸武力，被打败的体制才会不得已而接受新体制。在这个必然的大趋势下，诸多偶然因素就微不足道了。

英法联军之前，清朝在威胁下已经接受英方的“修约”。“修约”的原因是由于《南京条约》签订十几年之后，英国已不满意现状，想要增加利益条款；清廷虽不愿意，也无可奈何，只好接受。但问题出在如何进京换约：英方不肯接受清政府指定的进京路线，而且还要求几千兵马同行，这当然会引起咸丰皇帝的疑虑，因而和战不决，和议的价码也就节节升高，最后还是以战决胜。法国因传教士命案而与英国联手，好像是一个偶然因素，其实不过是借口而已。如果没有巨大的利益可得，不可能为一件偶发的命案而劳师动众。中国的再次屈辱是军事科技落后的必然结果，英国三千军队就能征服印度，收为殖民地；相比之下，中国的命运似乎还略胜一筹。

我们不必过度谴责清廷的颀预无能，却不应忽视西方帝国主义的横行霸道。清廷被迫接受不平等条约，不敢不履行条约，然而在履行的过程中，对方往往横生枝节——如英国人坚持要入京换约，却不遵守清廷指定的路线，强要选择经过大沽炮台，而且还要带大批军队同行，不仅引起清廷的疑虑，也不符合现代国际关系的准则。

英国是19世纪的超强，征服了印度，为什么“不想征服整个中国”？我看非不想也，是不能也。清帝国不像印度那样松散，毕竟从中央到地方仍有完整的政治结构，人口众多，土地辽阔，整个征服，谈何容易？就是在19世纪末的“瓜分中国”，最后也未完全得逞。事实上，英法联军得到经济利益后，急着签约撤兵，因严冬将至，补给困难，旷日持久，可能生变。恭亲王也急着想要外国军队撤走，不惜答应任何条件，连原不相干的沙俄经由《中俄北京条约》也获得大块土地。

当和谈最后破裂时，巴夏礼为首的代表们想逃跑才被抓当人质，抓人质在西方也是常见的事。在西方人眼里，中国监狱是很不人道的，虐待俘

虏的确也是常有的事，所以要治外法权，但不能有双重标准：英法联军也抓了通州县丞，而且死在他们的狱中，更不必说联军对无辜百姓的不人等待遇——李慈铭在北京目击联军虐待中国妇女，吴可读日记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战争毕竟是野蛮的，但野蛮不是你的或他的，而是双方的。

所谓虐待俘虏、激怒英国，并不是火烧圆明园的最主要原因，只是火上浇油而已。英国统帅额尔金发现咸丰皇帝最关爱圆明园，所以他一定要烧，才能使中国皇帝感到痛；我觉得还有另一层原因：因在烧毁之前已把园内最好的东西抢劫一空，将整个园一把火烧了，被抢的珍宝便无法追索，未尝不是一种故意灭迹的行为。我也不认为额尔金之流会在意历史上的骂名，就是在儒家中国，春秋笔法也并不足以使乱臣贼子惧——如果真惧的话，就不至于历代不断有乱臣贼子的出现。

法国作家布立赛的《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是目前叙述英法联军攻打北京、抢劫与烧毁圆明园最详尽的一本书，颇有参考价值。但作者是法国人，不免偏袒法国，把圆明园大劫难的责任，归之于英国人。法国军队只比英国军队早到达圆明园一天，到达后并没有立即抢劫。公平地说，抢劫是英法一起干的，不必分先后轻重。法国人的确不赞成烧圆明园，因其认为不应用暴力来对付一座和平的皇家林园；不过，法国又说，要烧的话，应该烧紫禁城里的皇宫，因那是中国发号施令的中心，这才有针对性。所以雨果说得对，英法是两个“强盗”，烧皇宫还是烧圆明园只是两个“强盗”之间的争辩而已。恭亲王留在北京议和，在火烧圆明园之前已经完全屈服了，并一再请求额尔金不要烧，反而加大额尔金焚毁圆明园的兴趣。

不过，布立赛觉得火烧圆明园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已经不容易，可以说是有一点“反思”的意思。从前以及现在仍有不少中外人士认为圆明园是皇家的园子，关老百姓何事？他们忽略了圆明园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缩影，是一个实质文化的呈现，而一个文化在暴力下消失，不仅中国人要关切，全世界爱好文化的人都应该关切。对中国人而言，圆明园被外力摧毁当然是一国耻，以此激励民族感情也无可厚非。

清朝皇家对圆明园的失落最感痛心，固不待言。咸丰皇帝在热河英年早逝与伤悼圆明园不无关系，慈禧与同治帝不惜政治与经济的压力，一意

要修复圆明园，其性情可知。中国一般国人的伤悼之情也是真诚的，如史家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在北京茶楼看到天边浓烟，知道圆明园起火，不禁痛哭失声；康有为在巴黎看到圆明园遗物也感到伤心。民国以来不同背景的官方与民间人士亦多对圆明园表达哀悼，甚至愤怒。直到最近海外还有一位华裔女作家张纯瑛来到圆明园废墟，也不禁流泪，称之为“中国的哭墙”。可见 150 年来中国人的伤悼之情一直延续着。当然，伤悼之余要能理性思考，必须认知到：国家没有实力，必然招辱。圆明园兴盛的 150 年不能不说是一种“文明的崛起”，然而没有武力作后盾，这个“文明”活生生地倒下了。大国如果没能在经济上与军事上先崛起，也就没有崛起的基础，又如何谈文明或文化的崛起？

伤悼圆明园的失落，并不必刻意重建圆明园。我是最早不赞成重建之一人，重建后的圆明园是假的，更何况即使有钱重建，也无那种重建的手艺。请看珠海的圆明新园，真是令人不堪入目。我很高兴知道有 72.1% 的网友反对重建或修复圆明园。如何好好保护圆明园遗址，才是要务。圆明园作为遗址公园宜尽量少具旅游的商业色彩，而保持遗址的悲壮氛围。

具有民族感情的中国人都想追回圆明园流失的文物，我不知道有何正当或合法的途径可以追回“国宝”，因为那些“国宝”是被不正当、不合法的手段抢走的。不过，铭记历史与保护遗址和追回文物是两回事。铭记历史不仅指铭记圆明园的历史，还牵涉到当今“史盲”的问题——今日有太多的人不重视历史，很多年轻人对历史不感兴趣，历史知识也愈来愈浅薄，不仅中国，全球都如此，值得我们正视。拙著希望对铭记历史起一点作用，希望圆明园的灰烬不要使青史也成灰，青史的价值要在真实，从真实的历史中才能吸取历史教训。

这本双语版《追寻失落的圆明园》将我的英文原著与钟志恒的中译本合为一册，外研社人文社科分社的易璐女士做了辛勤而又仔细的整编工作，她指出一些潜藏的错误与笔误，提出不少宝贵的意见，依照中英文对应的原则对中译本的文字也作了进一步的润饰，更加符合大陆读者阅读的需要，使我这本旧书多少有了新的面貌，少些失误，对此我衷心铭感。

汪荣祖 2010年8月31日写于美国华府

简体中文版弁言

本书中译本《追寻失落的圆明园》由台北麦田出版社出版后，江苏教育出版社吴兴元先生即与我联络，非常热心地要出大陆简体字版，并先后向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与麦田出版社购得出版权。不到几个月，简体版的校样已经印出，增加了不少图片，改正了一些笔误，印制也大方美观。我对小吴的敬业与诚恳，表示感谢。

此书原由英文写作，当然要顺着英文的语法与思路写；然而由英文译成中文，译者往往不能完全摆脱原来的语法与思路的羁绊，以便转化为道地的中文，读来不免有点别扭。我于审订译稿时，虽多加润饰，但难以改头换面；此次校阅简体校样，又作了若干文字上的修订。我若用中文写此书，写法肯定会大不相同，不仅文字而且谋篇都会很不一样。

我们华人碰触到圆明园，大都*会带点民族情绪，从当年亲眼看到圆明园起火的陈宝箴、目击英法联军烧、杀、抢、奸的李慈铭，到近代变法家康有为、保守派作家林纾、中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李大钊、诗人顾随、学者向达、将军张爱萍，各人思想背景虽异，对名园遭外来暴力所毁，莫不痛心疾首，都感到莫大的屈辱与悲愤。我个人初访荒芜的圆明园时，也不免触景生情，很能体会前人的悲愤，曾调寄《水龙吟》一阙：

名园早已荒芜，百年憾事今难状，天津失守，北京易手，皇城焚掠。壮丽成空，火龙吞树，残垣相望，叹金楼凤阁，都成劫烬，寻陈迹，空惆怅。

闻道旧园新造，乍听之心情波荡，山林仍在，玉泉滋润，清流可畅。只欠东风，吹开帘幕，碧湖连涨，愿天公眷佑，长春不谢，坐圆明舫。

当时填词的心情仍希望能重现圆明园的昔日光辉，然而当写书时，已感到重修圆明园之无意义，最大的问题尚不是财源，而是技艺失传。再者，即使财、艺俱备，再造出来的圆明园也是假的，还不如好好整理与保存真实的遗迹。圆明园虽称“万园之园”不误，但其不同于万园，正因其具有异于寻常的兴亡痛史。遗迹所呈现繁华与屈辱的历史记忆以及现场逼人的

沉寂，也正是此园之所以特别令人低回、起遐想之处。圆明园遗址的悲凉之美，自然而然会激发无从压抑的民族情感。

我在写圆明园遭遇到洗劫与焚毁一章时，力求作一个“无情的历史书写者”（dispassionate historian）；然而，不容置疑的史实与普世价值昭示我们，抢劫以及焚烧圆明园都是难以自圆其说、难辞其咎的行为。最近香港大学英文系一位副教授为文指出，下令焚毁圆明园的第八代额尔金男爵的父亲任驻奥斯曼帝国大使时，即曾破坏文物，将希腊帕提农神庙（Parthenon）里的雕塑大理石像运回苏格兰老家，被伟大的诗人拜伦（Lord Byron）痛斥为太无天理与可恶的文物强盗；拜伦极爱希腊，故痛恨之至，因而要“让仇恨[永远]追索他（额尔金）的贪念”（May hate pursue his sacrilegious lust!）。半世纪后，儿子走父亲的老路，不仅抢走圆明园里的珍贵文物，而且将抢不走的烧了。这位作者觉得，从希腊被盗的石像到圆明园的废墟，对之必须作道德的批判，用“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来合理化 19 世纪的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是“不道德的”，因其乃人类共同记忆中非人性的案例，必须谴责。”

当年写作此书时当然有未见的资料，特别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大量内阁大库明清档案，然今已数字化，极易引用；其中有关圆明园者至少有 192 笔，诸如乾隆九年元月总管内务府“谕典籍厅奉上谕，新岁朕奉皇太后驻蹕圆明园，所有灯节恭进皇太后筵宴及赐蒙古王等筵宴，应照旧举行”；乾隆十七年内阁大学士傅恒奏：“辛未科庶吉士散馆，拟于十月四日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考试，伏候谕旨”；乾隆十八年大学士陈世倌奏报：“西洋波尔多噶尔亚国进贡来使巴哲格，应赍方物进献，据钦天监择吉至日，带领来使至圆明园进献，恭候内廷收讫，知会内务府等所，有赐宴等事”；乾隆五十五年八月礼部“移会典籍厅，所有二十日正大光明殿筵宴其应行入宴之朝鲜等生番，在京一品文武大臣，外省提督巡抚，衍圣公，照例于是日五鼓，前往圆明园入宴”；道光十六年四月礼部“移会内阁典籍厅，本年丙申恩科典试，皇上驻蹕圆明园，相应预行知会各衙门，凡开列读卷大臣务于四月二十日黎明各咸集圆明园，听候钦点”；道光二十年翰林院“谕稽察房奉上谕，庶吉士于四月十六日在圆明园正大光

明考试”；同年礼部“移会内阁典籍厅为本年十月初十，皇太后万寿圣节，皇上诣绮春园进表行礼”；嘉庆十年七月十八日圆明园“谕典籍厅为库掌伊萨布等呈，称皇上谒陵，请照例谕行各衙门于圆明园大宫门两边各部院衙门朝房，派人前来看守，并将人役花名谕覆本处”。类此档案文献均可补充本书所述，圆明园除游乐以外，颇有繁忙的公务活动。

内阁大库档案也为本书所述圆明园里的“罪与罚”提供新的例子，如乾隆三十二年五月公兆德家人成禄在圆明园用刀戳伤袁朝礼并致死，刑部请旨将成禄即行正法。此未必是谋杀案，但不论动机为何，伤人致死按当时杀人偿命的原则，被判死刑不足为奇，也给我们提供了在圆明园内犯罪而被处死的例子。又从乾隆二十七年十一月五日的档案得知，看库步兵杨廷璧挖掘偷窃银库，也是拿送刑部严审；不过，巡防不力的参将李全等人则交兵部严加议处。

此书英文版精装与平装只印了 1000 本，“麦田”中文版也只印了 2500 本，对圆明园有兴趣的广大读者、有资格的评论者必求之于中国大陆，故吾于简体版寄厚望焉。

汪荣祖

2005年8月6日 写于台湾嘉南平原

* 所谓“大都”者，即并非所有的华人都有这种民族情绪，但亦非所有的西洋人都不可能对这种民族情绪具有同情感，如 19 世纪有法国文豪雨果与美国文豪马克·吐温，最近则有法国历史学者、资深记者贝尔纳·布立赛。布立赛写道：“圆明园被洗劫，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心灵创伤，就同 1871 年普鲁士士兵入侵法国，将卢浮宫和凡尔赛宫一并摧毁那般无法愈合”，颇具将心比心的同情感。布立赛的新著《第二次鸦片战争：洗劫圆明园》中文版（又名《1860：圆明园大劫难》）将于 2005 年 9 月问世。见 File: A5601YMY.GB Chinesenewsnet.com 2005 年 5 月 30 日。

** Q. S. Tong, “From Athens to Beijing: The Elgin Marbles and the Ruins of Yuan Ming Yuan,” *Ex/Change*, No. 13 (June 2005), p. 15, 另参阅 pp.10-13。

繁体中文版引言

我的英文版原书《追寻失落的圆明园》(*A Paradise Lost: The Imperial Garden Yuanming Yuan*)于新世纪的第一年由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并被全美研究图书馆权威期刊《选择》(*Choice*)评选为2001年度“各学科最佳学术著作”(List of Outstanding Academic Titles)之一,出版社与作者都感到莫大的殊荣。今承钟志恒先生费心翻译成中文,衷心铭感。

圆明园是清朝五位皇帝——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的皇家大乐园,历经一百五十余年的不断经营,工程几乎无一日中断,遂集明清园林建筑之大成,更包含西洋建筑,成为大清帝国的一颗灿烂明珠,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也是最有名的大型宫殿式御园。

中国传统帝王在儒家的影响之下,正式宫殿的设计都要按照《周礼》的规格,虽望之俨然,庄严隆重,合乎礼教,住在里面却不一定舒适自在,自然会利用其雄厚的资源,别建离宫,寻求舒适自在,满足享乐的欲望,于是汉有上林苑,唐有大明宫,宋有艮岳。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辽、金、元,也在北京一带建筑皇家园林。到明清时代,建筑跟庭园设计经过数千年之演进,已臻成熟,甚至完美的境界。清朝皇帝即在此雄厚的基础上,挟其开国后丰厚的国力,在北京西郊营建了一系列的皇家园林,而圆明园就是其中最富丽堂皇的一座。

圆明园原是康熙给四皇子雍正的赐园,最初在规模上远逊于康熙本人的畅春园。雍正继续之后,逐渐将圆明园作为清帝的主园,因而开始扩建。清朝虽是少数民族政权,但汉化颇为彻底,无疑是一儒教帝国。雍正之重视礼教,固不在话下。他为了扩建圆明园,有意或无意中表露出为了享乐而有违礼教的顾忌。作为天子,举天下供奉一人,似乎是理所当然之事,然而作为一位好天子,却不欲过用物力,尽情享受。他登基不久,适逢母丧,特意延迟了正式入居圆明园的时间,可见自知园居是一种享乐,有碍儒家的丧制。

雍正皇帝一旦于 1726 年农历新正大张旗鼓入园之后，迅将园居作为常居。他显然觉得于心有愧，所以力言圆明园不仅是行乐之地，也是行政之所，并下诏在园内处理国政。他绝不是说说而已，立即在园中建起正大光明殿、勤政殿等官署，办起公来。朝中将相大臣亦络绎于途，来往于紫禁城与圆明园之间。惟当风雪严寒时，可免老臣朝见，不必为皇帝的园居付出过多的代价。雍正为了警惕自己，在园中的勤政殿里，高悬“无逸”两大字以自勉。雍正确实是一位勤奋的皇帝，似未因园居的快乐而妨碍公务。也许就他而言，可以在享乐与礼教之间得到一些平衡。

自此，圆明园成为皇帝常居之所，也因而成为活动频繁的一个中枢。从内阁大库档案可知，六部所报事由颇多与圆明园有关。诸如礼部于乾隆三年六月，知会指名官员于初十五日五鼓时分“赴圆明园内阁朝房齐集以便带领引见”；户部于乾隆五年六月十八日，在圆明园该部朝房集议河南省、田主、佃户交收租息事；乾隆于四十六年、五十五年分别驻蹕圆明园，主持殿试事宜，又于五十五年八月二十日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设宴款待朝鲜等使节，以及在京一品文武大臣与外省提督等。皇上在圆明园设宴，引见官员，办理殿试、会试、复试等尤称常态，历五朝而不衰。

雍正扩建圆明园及其属园的欲望已很强烈，但比起乾隆皇帝来，可谓“小巫见大巫”。乾隆于 1738 年服完三年之丧后，正式住进圆明园。他自小就接受严格的训练，刻意要求自己做一个符合儒家规范的好皇帝；然而他对圆明园的钟爱以及大事扩建的欲望使他难以自禁。在礼教影响之下，他自觉过多的营造与个人享乐有违儒家伦理，但在物质条件许可之下，仍然忍不住尽情大兴土木，以遂游观之乐的强大欲望。从他一方面诏谕不再营建、另一方面仍营建不懈的作为上，可见其矛盾的心理。他除了完成圆明园四十主景外，更向东扩建，营建完全以游乐为主的长春园，并六次南巡，将江南园林的精华，如狮子林等等，移植到扩大的圆明园。长春园以乾隆退休后的居所为名建造，然而事实上，早在他退休前 40 年，长春园已经建成。我们不得不怀疑，他南巡的主要目的，名为探视民瘼，实为寻景建园。他为了建园所提出的种种理由，处处显示享乐与礼教在他心目中的天人交战。营建之欲终于战胜了简省民力之德，圆明园也就在乾隆时代成为万园之园。大清于乾隆晚年虽已由盛而衰，但圆明园的经营仍然不遗余力地持

续，这是明显地糜费国库民财。

嘉庆皇帝集中财力兴修绮春园，并将其纳入圆明园，形成圆明三园的格局。道光虽以俭省著称，却肯在圆明园上花钱，兴建了好几座大戏院；至于维修与小工程，更从未间断过。咸丰登基时，正值太平天国运动，内忧外患，军费浩大，根本无力再事扩建，即使维持现状，也感罪过。圆明园原是供清帝游乐而建，但咸丰园居，竟成为话柄，传出种种荒淫无道的传闻。其实，从档案资料可知，有一次咸丰于赴天坛祭祀的前夜，在园中曾痛哭失声；然则咸丰天人交战的压力，由于国势的衰微，较其前任有过之而无不及。

西方人往往认为，圆明园是清朝皇帝的离宫或夏宫；其实非也，而是清帝每年居住最久之地，自雍正起已是另一处听政之所。住在圆明园显然要比住在严肃的紫禁城里舒服得多，除了祭祀和礼仪之需必须回紫禁城，并且到承德狩猎、赴曲阜祭孔外，皇上大都是园居。以 1775 年前后为例，乾隆在园中一共居住了 168 天，居紫禁城 105 天，居承德 66 天，居曲阜 44 天。长久住在美观舒适的圆明园，日久自然生情，其情更表之于御制诗文，乾隆尤其是多产的诗人，对圆明园的四季景色，多有吟咏。此园无疑是清帝最珍惜钟爱、最引以为傲的一个大乐园。

英法联军的主帅额尔金（Lord Elgin，1811—1863）决定焚毁圆明园，主要原因就是知道清帝宝贝圆明园之深，故要焚之而使其痛。咸丰得报，果然痛心疾首，不久以 30 岁之英年，客死热河。圆明园之毁对清廷的打击固不止于咸丰皇帝，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对圆明园的怀念，均情见乎辞，甚至不顾众议，表达重新修复圆明园的强烈欲望。这种欲望更掺杂了强烈的国仇家恨情绪。但是在内忧外患的情势下修园，要比在盛世修园，更难被传统的道德观所接受。何况财力已经枯竭，根本无力修园。然而年轻的同治皇帝，在个人的期待跟母后的压力下，居然一意孤行，流露对圆明园无可排解的怀念之情以及想要恢复旧时御园难以克制的欲望。

同治皇帝竟以儒家的孝道为名，作为重修圆明园的理由。他的父皇咸丰因圆明园之毁含恨而死，并于弥留时将圆明园同道堂的印章相赠，以示不忘。他的母后慈禧早年在圆明园得到宠幸，且在园中生下同治，自然对于恢复御园旧时的风光，最为殷切。然而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国库空虚，